

徐永青
戴战军 著



年代风华录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44.652
0574



年代风华录

徐永青
戴战军 著

80年代风华录

徐永青 戴战军 著

*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枫叶印刷厂印刷

*

ISBN 7—81004—056—1/I 5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9375 字数：219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册 定价：2.70元

序

曹 璐 赵玉明

很乐意为《80年代风华录》这本书写一些话。这是因为，本书两位年轻的作者都是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学生。作为他们几年前的任课老师，我们在阅读这部书稿的时候，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喜悦。

两位作者，一位是广播记者，一位在新闻性、综合性期刊任副主编。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还采写了相当数量的新闻性、文学性兼有的纪实作品。《80年代风华录》就是从中选编的一个结集。其中的一些篇章还在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新闻、文学评奖中获奖。

应当感谢变革的时代，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使两位作者接触到了如此广阔的社会生活。难能可贵的是，两位作者对变革时代的热情和赤诚，作品的字里行间凝结着作者的追求和思考，闪耀着激情和思辩的火花。收入本书的二十篇作品所涉及的领域是较为广阔的。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改革大潮中的一条小船》、《银燕翱翔录》等几篇作品中得到近距离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奉献及丰富的心理层次在《生命之歌》、《牛的传奇》等作品中得到了真实而生动的再现，动人心弦，情真意切；《双城堡事件》对当年那个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做了详尽的实录，表现了作者勇于触及社会矛盾的锐气，给人

诸多思考。讴歌时代风貌，为当代众生相写真亦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以细微的笔触，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把我们时代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各行各业的人物推到人们面前：从领导人到个体户，从著名演员、画家、运动员到普通的母亲、工人、干部、政法工作者、残疾人等等。其中《笑之塑造》、《人们管我叫“阿信”》、《一个独腿人的足迹》、《母亲的抉择》、《生杀大权》以及《鞋王》等都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和感受，这里不一一评述，留待读者各自去领略其中的韵味吧！

《80年代风华录》是时代的产儿，她记录了时代的风采，也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书中的作品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有的成篇仓促，有的开掘不够深，对矛盾的复杂性展示不够透彻等等。特别是早期作品可以看出当时积淀在人们心理的思维方式、文风等方面的痕迹。尽管作者曾想努力突破这些羁绊和局限，却仍难免在作品中或多或少留下印迹。两位作者把书稿拿给我们时一再谈到其中的不足和遗憾。这是他们的心里话。他们毕竟年青，他们正在经历着不断思索、走向成熟的过程。相信作者不会把书中的缺陷视为不可避免，而是将本书作为一种鞭策、一种动力、一种责任。他们将无愧于时代的馈赠，不会辜负读者的期望。他们的作品也会象他们自己那样，锤炼得更加扎实、更加成熟。

人生和事业的道路漫长又短暂。人生跋涉都会留下深浅不同的足踪。尽管每个人的素质和客观条件不同，但是有一个启示却是共同的：只有执着追求，发奋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就能走向成功。本书中一篇作品的标题形象概括了这个普通而又永恒的道理：“奋斗的歌，没有休止符”。

让我们以此共勉。

1987年12月

目 录

序·····	曹 璐 赵玉明 (1)
生命之歌·····	(1)
银燕翱翔录·····	(25)
改革大潮中的一条小船·····	(37)
鞋 王·····	(43)
织补大王·····	(73)
人们管我叫“阿信”·····	(87)
纽 带·····	(96)
牛的传奇·····	(109)
鲜花与荆棘·····	(122)
笑之塑造·····	(133)
奋斗的歌，没有休止符·····	(152)
红梅的性格·····	(159)
流浪画家·····	(173)
在“0”的突破口上·····	(180)
我骄傲，我有这样的姐妹·····	(192)
一个独腿人的足迹·····	(200)
名副其实的人·····	(220)
母亲的抉择·····	(230)
生杀大权·····	(241)

双城堡事件.....(250)

后 记.....(281)

生命之歌

在雷阵的大合唱的激荡下
在闪电的长鞭的抽打下
在暴雨的箭簇的攻势下
在冰雹的霰弹的射击下

飞跃着一个奋斗的灵魂
在每月六十九元的工资袋里
在每餐缺乏热气的饭碗里
在每件打着补丁的衣服里
在旧报纸糊成的灯罩里

闪耀着一个美丽的灵魂
在整洁而静寂的病房中
在医生含着忧虑的温和的目光中
在癌细胞猖獗于一时的躯体中
在熟悉的和素不相识的人们的悬念中

屹立着一个自信的灵魂
在录了十分钟的磁带停止转动的一瞬
在生命触到短暂路程的终点线的一瞬
在一颗闪亮的星陨落的一瞬
在无数朵晶莹泪花绽开的一瞬

永生了一个圣洁的灵魂

——题 记

1982年10月25日，二百多名气象专家聚集成都，中国气象学会年会开幕了。就在这天上午，大会学术论文组副组长、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雷雨顺突然晕倒，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

“这是真的吗？”与他同吃早饭的同志震惊了：饭桌上，他侃侃而谈，说要博采百家之长，补己之短，把气象科研搞上去，怎么会半小时后就晕倒了呢？

“不可能！”学术论文组的同志噙着泪水，更不相信：“昨天，他开了一天的筹备会，晚上和我们一起安排大会发言，一直忙到十点多钟。”

“不可能！绝不可能！兴许大夫诊断错了？！”

人们怎么也不相信，他，这位正值四十七岁、精力是那么充沛的中年人，怎么会突然被癌症击倒呢？

几位领导同志当即赶往成都空军医院。传染科主任拿出了X光底片和诊断书，沉痛地介绍了病情：从X光底片看，他的左胸腔全部、右胸腔下三分之一，已充满积水。并且从积水中发现了大量癌细胞，因此，“他患肺癌是确定无疑的。”

这，不啻晴天霹雳。几位领导同志由惊愕转而心疼、惋惜。

“唉！都怪我，不该拉他来开会！”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陶诗言心疼得连连摇头。

其他几位同志安慰陶先生：“不，他呀，干工作从来是百米冲刺，是累坏的呀！”

是的，在雷雨顺的观念中，工作是最神圣的。仅仅在1982年的头十个月，他就做了那么多工作：

1月，他主持了《全国强对流天气论文集》的编辑工作；

2月，他去澳大利亚参加世界气象组织大气物理委员会工作会议；

3月，他在丹东主持了北方暴雨技术组会议；

5月到9月，他参加两个月外语进修班，完成了两部大约有30多万字的气象学编著工作；

10月，一位美籍华人教授来华讲学，雷雨顺是接待人之一，主持报告会、座谈会，陪同参观。10月1日，他安排别人休息，自己主动陪这位教授游览。游至颐和园，教授要登高远眺，看到雷雨顺不断地喘气、擦汗，踌躇了。雷雨顺却说：“不要紧，上吧！”他搀扶着这位教授爬了一百多级台阶，登高鸟瞰了首都西郊的风光。

11日，距气象学会年会开会只有十四天了。雷雨顺投入紧张的会议的准备工作。他要从一百六十篇论文中选出四十篇，交给陶诗言副理事长审定，以便在年会上进行交流。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可是，这时他的身体开始不断地出“故障”了。夜里常常心慌、憋气，连半小时也躺不下。他索性不睡了，打开所有的门窗，让冷空气刺激脑神经，继续阅选论文。

21日下午，就要乘163次列车赶往成都。上午，他来到办公楼。上三层楼梯，竟休息两次，走到办公室已是冷汗淋淋，不住地喘粗气，脉搏猛增到每分钟一百四十次。同志们急了：“病成这个样子还想去开会？快去医院！”他很不情愿地到了医院，但他没时间做全面检查，只做了心电图。结果，心脏基本正常。当他步履蹒跚地回到办公室时，却又兴冲冲地对同志们说：“哈哈，后勤部（心脏）批准了，去开会没问题。”

下午，他登上开往成都的列车。买的票是卧铺，却不能卧，因为心慌憋气，眼巴巴地坐了两夜一天。

23日抵达成都。他和接他的同志开玩笑：“车上把我弄苦了，我以为要去见马克思了，谁知马克思说：‘你还没完成任务哩。’”

他不要我，我还不想去呢。”下车后，他没有休息，一头扎进会议的组织工作，直到休克前一分钟，还在催问发言次序打印好了没有。

人们不禁要问，他那充沛的精力，顽强的毅力从何而来呢？

二

雷雨顺1935年生于陕西铜川一个农民家庭。落地八个月，母亲便过早地去世了。他的孩提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在华夏大地恣意横行。国耻、民辱给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复兴中华的种子。解放了，他进入新中国的学校。1953年1月，他尚在读高中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动机一栏，他庄重地写下：“共产主义是伟大的、壮丽的，实现她也是必然的。我，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无比光荣的。这种光荣不是名利、地位，而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决心把毕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1965年，雷雨顺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分配到中央气象局（国家气象局前身）工作。1966年9月，他从新疆“四清”后回局，迎接他的却是鄙视知识、践踏科学、摧残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十几年党的教育，党性的锤炼，使他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停留在本本上，更不是显露在嘴皮子上，而是体现在亿万人民脚踏实地、前仆后继的实践中。他“逆”潮流而上，利用科技情报组组长一点点可怜的权力，带领同志们从事业务研究。从1968年至1972年，他和同志们一起，完成了《气象与军事》和《英汉气象学词汇》（修订本）的编辑工作，翻译了《大气环流系统》一书。然而他赢得的不是赞扬，却是“白专道路”、“老右倾”、“业务党”的一顶顶帽子。

在风言风语面前，他一不软弱，二不懈怠，而是越干越猛，

成果越来越显著。

1972年，一场罕见的冰雹使上万亩丰收在望的麦田夷为平地。雷雨顺，这位农民的后代，他了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更清楚农民那种渴望“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愿望。他久久地望着取回的雹块。他在想冰雹形成的机制，冰雹造成的后果，然而想得更多的是当冰雹来到之前……

为了揭开冰雹之“迷”，他广泛地查阅了俄、英、日、德、法几种文字的专业文献，分析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填写了两千三百余张卡片，写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冰雹概论》初稿，并于1974年在其他两位同志帮助下定稿出版，为准确地预报冰雹，进行人工消雹试验做出了贡献。

或许有人问，在那种“风雷激”、“云水怒”的日子里，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多奉献？归结为他常说的一句话：“我是拿党和人民的助学金长大的，把知识还给人民，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

人们往往用“风云变幻”、“气象万千”来形容大气层的复杂性、多变性。因此，准确地做好天气预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做好这项工作又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暴雨、冰雹等灾害性天气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1975年8月河南暴雨给国家造成上百亿元的损失，这是大自然给气象科研提出的严肃课题。雷雨顺在痛苦、内疚之余，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找出暴雨预报的有效手段。他常常对同行们说：“为什么不能拿出我们自己的好方法，及早做出预报，减免人民的损失。”

雷雨顺就是怀着暴雨要有我们自己的预报方法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完成《冰雹概论》一书的同时，自寻课题，自动和

其他两位同志结成课题组，从大气蕴藏的总能量与大气不稳定理论入手来探索新的预报方法。

能量学在气象界并不新颖，也不陌生。本世纪初，人们便从能量守恒与能量转换方面探讨大气运动规律，但他们的终点仅限于理论分析。在科学的入口处往往有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或走向真理，或变成谬误。雷雨顺等同志，经过几年的艰苦探索，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们系统地研制出一套物理量图，制作了一套查算表和计算程序，使大气能量学从纯理论研究中挣脱出来，形成了一种新的预报暴雨、冰雹的方法。这一方法破土而出，引起了气象界老一辈专家的关注和支持。陶诗言同志认为，“这一方法是我国独创的，结果令人鼓舞。”学部委员、北京大学谢义炳教授撰文说：“能量天气分析及预报方法，揭示了强烈天气的前兆现象，找到了行之有效的预报指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叶笃正在总结近年来我国大气科学研究的进展时指出，能量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能量天气学研究”获奖了。

出名了。雷雨顺不但在国内，国际上也有了点名气。有些国家转载了他们的论文，就连被封锁的我国台湾省的气象专家也问我们的出国人员：“大陆有一个雷雨顺，他们突破了传统能量学的框框，搞了一套预报方法，这雷雨顺是不是化名呀？”当我们出国人员回答说“不，他是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名就叫雷雨顺”时，这位台湾省的气象专家不无敬佩地说：“雨顺，雨顺，风调雨顺。”

在名气面前，雷雨顺常常对同志们说：“我们不能躺在成绩上，别忘了咱们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双肩挑。一肩担科研，另一肩挑推广。”为了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产生经济效益，雷雨顺与其他同志一起，先后到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气象部门讲学，传授这一方法。按理说“能量天气预报方法”是他们几年

刻苦钻研的结晶，可以用一个讲稿，照本宣科。他不，每到一地，先要了解听课人员的程度以及他们的要求，然后重新备课。安排的游览他不去，晚上的电影放弃了。但课讲得生动、具体，程度高的有收益，程度低的听得懂，个别的他加以辅导，包教包会。1981年10月，他应陕西省气象局邀请去讲课。不巧，住在西安的岳母病危。省局给他派的小车他不要。只借了辆自行车，利用中午和晚上侍候老人，夜里返回住处备课。最后一天，课讲到一半，电话传来了岳母逝世的消息，他忍着悲痛按原计划讲完。第二天他只有一天处理丧事，第三天便登上东行的列车赶往河南去讲学。

1981年8月，长江上游出现洪峰，严重威胁长江中、下游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上游地区持续有大雨，那就必须采取分洪措施。“有无大雨？要不要分洪？”国务院领导同志守候在电话机旁。中央气象台进行了紧急会商。值班预报员综合了各种预报方法，果断地作出了字字值千金的决断：“两日内长江上游无大雨。”中央领导同志放心了。长江中、下游分洪区四十万人民、六十万亩土地可保安全无恙。据统计，仅搬迁费一项就为国家节省了上亿元。在这紧急关头，雷雨顺等同志根据能量方法，也作出了正确判断，为值班预报员提供了一种预报依据。

1982年汛期，几场特大暴雨使黄河水位猛涨，比1958年洪水还高过十七厘米。据有关方面估计，如果河水溢出河道，将给国家造成一百亿元的损失，但由于水利、防汛、气象、水文等部门通力合作，黄河洪水驯服入海，为国家避免了重大损失。气象部门在这次黄河防汛中做出了准确及时的预报，雷雨顺等同志研制的能量天气学预报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能量天气学预报方法迅速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气象部门开花结果。为此，国家农委和国家科委于1982年3月再次授予该成果以“农业科技推广奖”。

四

1968年以来，雷雨顺编著或参加编著了六部书，写出了十三篇有一定创见的论文，以他牵头的课题组，取得一项重大科研成果。

他用什么作代价，换取这累累的果实呢？

为了事业，雷雨顺舍弃了小家庭的温暖。

雷雨顺和刘秀芳夫妇俩都是事业上的奋斗者。

繁杂的家务成了他们的累赘。雷雨顺把全部心思扑在科研上，爱人叫他去买米，他舍不得放下外文资料，拿起米袋边走边看。到了粮店才发现没有带粮本，只好回家去取。第二次到粮店，却又把米袋忘在家里。饭后他去洗碗，水哗哗地冲着，他又想起了课题，碗没有洗，却连水带碗又端了回来。他们也曾把嫂子和姐姐接来料理家务，但猛增两三口人的消费，在家庭收支的天平上不能不出现倾斜。由于夫妻俩都是忙人，常常顾不上家务。他们唯一的儿子雷钧，从五岁起就承担了去食堂买馒头的任务。一个下雨天，小雷钧在食堂买好馒头后朝家走，一不小心，滑进路边的水沟，他身子泡在水里，馒头却高高举着，直到来人把他救起。别的孩子都笑他傻，但有谁知道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刻上了：“爸爸妈妈要吃饭，吃完饭好干大事。”为了减轻家务负担，夺回刘秀芳上、下班路上消耗掉的时间，他们于1981年春节商定：刘秀芳带着儿子搬到北师大集体宿舍，雷雨顺一人留在局里面。从此，他们过上了一地分居的生活。

有人不解：“人家巴不得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你们怎么一地分居？”

他们总是笑笑：“生活嘛，应当首先服从事业。”

五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卡文迪许曾说过：“我认为科学家的时间应当最少地用在生活上，而更多地用在科学上。”爱人和孩子搬走后，雷雨顺重又过上“学生”的生活。总不离身的是一个黄色帆布挎包，里面除了书籍和资料，还有一个塑料食品袋，装着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他每天清晨起床，宿舍——办公室——食堂，三点一线，循环往复。他家里没有现代化家什，更没有雅致的陈设，也没有一盆鲜花。桌、椅、床、凳、柜，简朴而且极为普通。灯头用一根绳子牵到三屉桌上，上面挡了一张旧报纸，这便是工作台灯。有一点是富有的，就是屋子里到处摊满了打开的书。所里一个小青年来到他家，回去后对同志们说：“老雷的家不象个家，简直是个旧书摊。”他家另一个特点，即堪称“无烟火之家”。他让爱人带走了煤气灶，自己在食堂就餐。有时扎在书堆里，竟忘了开饭时间，他便拿出一块半块的剩馒头、剩花卷，用开水泡泡就是一餐。他以办公室为家，下班后要喝点开水，天冷了要用热水烫烫脚。“下班了怎么打开水？是不是舍不得煤气？”水房的同志质问他。“我……我……”雷雨顺无言以对，因为即便说明情况，烧水的同志也不会相信。

雷雨顺这次病倒以后，不少同志惋惜地说：“大胡子（人们称呼他的绰号）呀，大胡子，你搞能量那样精，可就不知道自己也要能量平衡，长期地输出大于输入，才落下这不治之症啊！”

雷雨顺常说：“我什么都不缺，最缺的是时间。”他珍惜时间，简直到了惜时如命的程度：

吃饭，嫌排队买炒菜太费时间，到小卖部买上一两猪头肉，二分钱腌辣椒。

分房子，放着条件比较好的大楼不上，却挑了离食堂不足十

米远的四层楼顶层。

看病，从来是马马虎虎。这次发病，几位医生都感到很惊讶。“这种病，至少半年前就应发觉。”近几年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办公桌上总是放一块擦汗毛巾。前一段他感到呼吸不畅，但总认为是鼻炎的原因，只是简单地要一点药，从未做过全面检查。有时，同志们劝他锻炼身体，他却说：“五十岁以后锻炼，五十岁以前就拼命干。”

睡眠，他压到最低限度，几乎经常五点半起床，六点来到办公室，晚上往往熬到十二点。以至住在办公室对面楼上的同志几次给研究所打电话：“请你们查一下，那是谁的办公室，每天都忘了关灯。”

节假日，他很少休息。星期天，家里来客人了。他对爱人说：“我宁给十块钱，也不愿瞎扯一分钟。”爱人了解他，支持他，自己的客人自己招待，他的客人没有业务关系的，也替他招待。但雷雨顺有言在先：“凡是来探讨问题或谈科研工作的，一定叫他到办公室来找我。”有人粗略统计过，雷雨顺除了正常工作的八小时以外，早晨要加出两小时，晚上要加出四小时，节假日也很少休息。这样他就多抢回了近一倍的工作时间。

六

凡是真正想在事业上做出贡献的人，几乎都很少计较个人的物质享受。雷雨顺常对组里的同志说：“人嘛，名利要少，志气要高。”这是他处理名利的一条原则。他是月薪六十九元的副研究员。有些大学时代的同学早已高过他，老同学相聚每每问及此事。他总是笑笑说：“我够花的。”其实他的负担并不轻。几年前他赡养岳母，哥哥、姐姐在农村，也要他不时地接济。两人工资东拉西扯就没了。可是每次有点稿费收入，雷雨顺总是按收入比